

出使四国日记

西洋  
映像  
手记

二十八日

香田君、光緒六年印度加爾各答下議林德華(即華里) 報國著法  
請及本國(即日本) 托亞國(即暹羅)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請及本國(即日本) 托亞國(即暹羅)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二十九日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日南國(即南美洲)



薛福成 / 著

八月或成華日記

香田君、光緒庚辰(即光緒十一年)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地理學(即地理學)



李雪涛 / 主编

# 出使四国日记

本书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醉六堂石印本

《庸庵全集》校注

薛福成 / 著

宝海 / 校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西洋映像手记 ·

## 出使四国日记

---

著 者 / 薛福成  
校 注 / 宝 海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 6526996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mailto:bianyibu@ssap.cn)  
项 目 经 理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祝得彬  
责 任 校 对 / 蔺鸿毅  
责 任 印 制 / 盖永东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设 计 排 版 / **3A** 设计艺术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58 千字 插 图 / 49 幅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7-80230-470-3/K · 064  
定 价 / 45.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

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政论家。他自幼即好经世之学，咸丰八年(1858)考中秀才，同治四年(1865)起投身洋务运动，先后充当曾国藩、张树声、李鸿章的幕僚，赞襄策划，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自光绪十年(1884)初夏，薛福成结束幕府生涯，被清廷实授为浙江宁绍台道。后历任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光禄寺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二十年出使任满回国，在途中发病，于六月十九日在上海病逝，终年57岁。薛福成的著述颇多，已经刻印的有《庸庵全集》(包括《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等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

## 西洋映像手记 (第一辑)

---

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
黎庶昌	《西洋杂志》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王 韬	《漫游随录》

---

这个系列主要是整理、出版清朝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到国外访问、游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当时一经出版即已引起很大反响。

他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理解异域文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

他们是借游记之名，讨论中国的问题，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

西洋  
映像  
手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使四国日记 / 薛福成著; 宝海校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1

(西洋映像手记)

ISBN 978-7-80230-470-3

I. 出… II. ①薛…②宝… III. ①游记—英国②游记—法国③游记—意大利④游记—比利时 IV. K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572 号



薛福成

(1838~1894)

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

——薛福成：《治平六策》





##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

——“西洋映像手记”序

李雪涛

形象学 (Imagologie) 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sup>①</sup>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述,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

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玛丽·卡雷 (Jean-Marie Carré) 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间的相互诠释”<sup>②</sup>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 (Paramārtha)、不空 (Amoghavajra) 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 (Raymond S. Dawson) 在《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 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sup>③</sup>与我在本

① W. Kubin (Hrg.), Mein Bild in deinem Auge - Exotismus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 China im 20. Jahrhundert (顾彬主编《你眼中的我的形象——20世纪德—中文学中的异国情调与现代化》), Darmstadt, 1995, S. Viii.

② 转引自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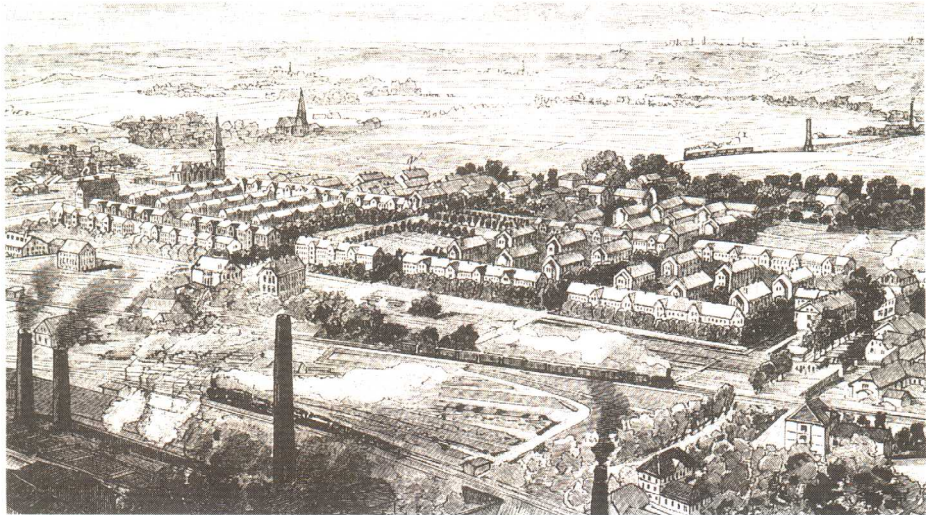
③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第16页。



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J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





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sup>①</sup>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间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sup>②</sup>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在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

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sup>③</sup>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们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sup>④</sup>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

① 莫哈:《史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9页。

② (清)郭连成:《西游笔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③ U. Weisstein, 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比较文学导论》), Stuttgart, 1968, Kapitel 4.

④ 转引自钟叔河著《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第562页。



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sup>①</sup>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sup>②</sup>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sup>③</sup>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

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其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sup>④</sup>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①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第583页。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419页。

③ 雪峰蕴文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7，页904a。

④ 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6页。



## 目 录

咨呈	008
自序	009
凡例	010
卷一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至闰二月二十九日)	
011	
卷二	
(光绪十六年三月朔至五月二十日)	
063	
卷三	
(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初十日)	
109	
卷四	
(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日)	
163	
卷五	
(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197	
卷六	
(光绪十七年正月朔至二月三十日)	
239	
跋	287
校注后记	291



## 咨 呈

钦差、二品顶带、大理寺大堂、出使英法义<sup>①</sup>比国大臣薛，为咨呈事：

窃查接管卷内，光绪四年<sup>②</sup>八月十六日贵衙门咨行“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等因。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本大臣于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sup>③</sup>由上海起程，一路访察外洋各埠情形，随所见闻，据实纂记。莅任以后，驰驱英法义比四国，又逐事考求，于各国形势，政事风俗，观其大略，编录成帙。

惟日记虽体例不一，而出使情事无甚歧异。查前出使英法大臣郭，及前出使英法大臣曾，俱有日记，所纪程途颇已详备。若但仿照成式，别无发挥，雷同之弊，恐不能免。此一难也。出使之职，固在联络邦交，至如觐国势、审敌情，贵

能见其远者大者。而事之真伪虚实，得失利病，本不易辨。或拘于一隅，而不能会其通；或震其一端，而不能究其极。若但掇拾琐事，见其粗而遗其精，羨所长而忘所短，津津铺叙，舍己芸人，无关宏旨。此二难也。中西通好，本系创举，非絮四千年之史事，观九万里之全势，无以通其变而应其机。偶有论说，抑扬稍过，恐失其平，或致议者之反唇，或启远人之借口。必斟酌夫理之当然，势之必然，权衡轻重，不可稍有偏倚。此三难也。有此三难，最宜审慎。

本大臣奉使之余，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牒，或抒胸臆之议，或备掌故之遗。不敢谓折衷至当，要不过于日记中自备一格。始于庚寅<sup>④</sup>正月，迄于辛卯<sup>⑤</sup>二月，分为六卷，用西洋糖印法，飭员楷录，印订六册，由文报局附邮寄送。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sup>⑥</sup>

① 指意大利 (Italy)。

② 1878年。

③ 1890年2月1日。

④ 1890年。

⑤ 18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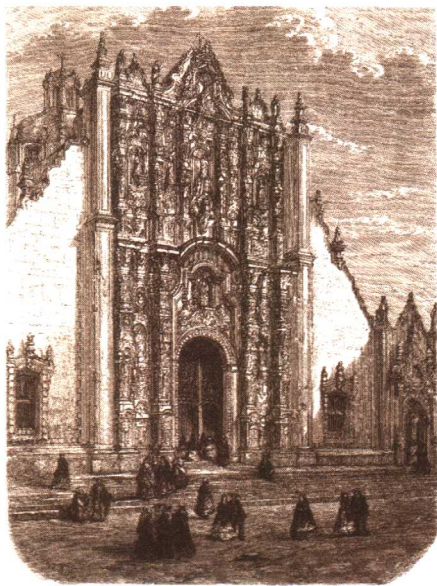
⑥ 1892年1月19日。



## 自序

光绪十五年<sup>①</sup>，为今天子亲政之初，福成奉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未及行。越明年二月，始抵巴黎，由巴黎至伦敦，四月至布鲁色尔<sup>②</sup>，又明年至罗马。既已奉宣德意，并撮其事机之大者，入告于朝廷；亦以咨谋询度之余，为日记六卷。大较由考核而得于昔者，十有五六；由见闻而得于今者，十有三四也。

义、比新造之邦，未遑远图。英人通商，法人传教，已遍通内地，交涉纷竞，视他国为甚。其分属英、法之缅甸、越南，尤逼吾南服。我不能闭拒阻遏也，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不图所安，非所谓狃于积习，粉饰自欺者欤？大抵今古之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矩天下，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往者，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然亦有效有无效。何也？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而不在于彼也。



至于风俗政令之间，亦往往有相通之理。试观其著者：其条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必其国之所以兴；其反乎我先王故籍之言者，必其国之所以替。即其技艺器数之末，要亦随乎风气之自然，适乎民情之便利，何新奇之有焉？吾闻管子之言曰：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然则天下之善知人长者，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

海外之国，崛起者五六。虎视而鹰睨，殆未有所定。或者形格势禁，惮于发难，先动者得祸，故莫敢妄举邪？孟子曰：及是时，明其政刑，谁敢侮予？福成以为时不可失者，无有切于今日者矣！

凡斯编所言，要有所致意。然太史公讥张骞使西域不能得要领，庸讵知我所谓至要，人固以为非要；我所谓非要，人固以为至要乎？是则非福成所敢测矣！

光绪十七年十月朔日<sup>③</sup>，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二品顶戴、大理寺卿、无锡薛福成自序。

① 1889年。

②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③ 1891年11月2日。





## 凡 例

一、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永叔《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后世纂日记者，或繁或简，尚无一定体例。窃谓排日纂事，可详书所见所闻；如别有心得，不妨随手札记，则亭林顾氏《日知录》之例，亦可参用。

一、郭筠仙侍郎有《使西纪程》，曾惠敏公有《出使日记》。大抵详于所历程途，间抒议论；既抵英法之后，即皆戛然而止。此书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为名，必俟遍聘四国之后乃可终卷。自庚寅正月起，至辛卯二月止，并闰计之，凡历十有四月。述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网旧闻。凡瀛环之形势，西学之源流，洋情之变幻，军械之更新，思议所及，往往稍述一二。

一、日记为出使而作，揆之体例，似当但就四国所见闻，随事详书。然中国所以遣使之故，在默察西国之情势，亦期裨益中国之要务也。若未能开拓心胸，综揽全局，既乏审机观变之识，更蹈舍己芸人之讥，殊失出使本旨。是以此书于四国之外，所闻关系中国之事，必详记之；即所闻关系各国之事，亦详记之。以示使职所当留心者，实非一隅一事可尽。

一、顾氏《日知录》之例，凡诂经评史，以及论时务、考掌故，偶获一义，皆可纂录。此编既为出使日记，自不能不稍示限断，必于洋务关涉者，始笔之于书。即有偶读邸抄、阅新报而记之者，亦因其事关系时局，不能不录。

一、英、法两馆存卷，自光绪丙子<sup>①</sup>以逮庚寅<sup>②</sup>。中外交涉，尽多关系重大之事。爰竭数月之力，发

而观之，摘其大凡，随笔纂录。所以此书首尾虽仅历十有四月，而交涉要件之可考者则已阅十有五年。使职固非一端，亦可稍知梗概。

一、凡事有一定格式，得其格式，事乃易办。中国遣使，本系创举，求之古书，并无成式可循。兹编于国书颂辞，无不详载，以存体制。至与外部往返洋文照会书信，间亦译登一二，用示格式，并可徵中西文法之稍有不同。

一、所记国书颂辞，意在备存格式，所以遇君主等字样，均照原式抬写。此外如君主及伯理玺天德等字，皆可不高。以此书专备吾华人记览，并无与彼国人交涉也。详玩约章，意自如此。

一、凡关系出使典礼，除呈递国书外，如：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及冬至、元旦，皆望阙遥贺；使臣初到时，前任使臣跪请圣安；前任使臣回华时，使臣寄请圣安；皆谨志之，以资考证。又如主国君主及伯理玺天德延请宴会，暨朝绅会、朝着会、听乐会、观舞会，亦必记其梗概，用昭从俗从宜之义。

一、日记虽排日编纂，然一岁之中，或值酬应繁冗，公务紧要，未必能整日闲暇。或积数日并无见闻，亦无新义。若必按日勉为纂记，非失之赘，即失之虚。兹编往往于一日中记至一二千言，或阅一两日无所记。今并仍其旧，以昭核实。

一、阴晴风雨，随地不同；况外洋之晴雨，更属无关紧要。然此为行役者之难易苦乐所由分，故凡在途之日，所值阴晴风雨皆详志之。迨抵巴黎后，则不记。即由法至英，至比，至义，轮路迅捷，多择晴明之日，亦可毋庸赘记。

① 1876年。

② 1890年。

